

千 年 文 明 论 赞

李 铁 映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开端,正是中国北宋开国不久,呈现出一派文明昌盛的景象。在此后的1000年中,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广泛运用,典籍文化、医药文化、建筑文化和文学艺术各领风骚。思想文化领域,理学盛行一时,心学别开生面,永康、永嘉,讲求实际。文人画、书法、古典诗词和京剧,成为精神文化的四大名牌。千年文明体现出强大的民族亲和力,讲究事物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其原创性与包容性紧密相联。在原创中包容,在包容中创新,是中国文化的性格。16世纪,中国国力下滑,清代乾隆后期,与世隔绝。后半期的二三百年间,危机重重,终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在新千年开始之时,考察和反思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命运遭际和文明收获,深化和重释“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历史意识,从中可以找出重振大国雄风的精神动力和历史经验。

关键词:千年历程;三大发明;四大名牌;文化品格;知耻奋进;再创辉煌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6-0005-17

中华文明又走进新的千年。这个“又”字包含着沉重的分量,包含着过去5000年的灿烂辉煌,包含着近百数十年的艰难曲折,更包含着远绍汉唐盛世、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意气轩昂。

历史赋予各个民族千差万别的命运,而各个民族在应对机遇与挑战的过程中,表现出千姿百态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作为人类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在公元前的3000年中就已留下坚实而辉煌的足迹。大量的古陶器、甲骨文字、青铜器物以及宫城遗址,显示了东亚土地上一个伟大民族在公元前3000至1000年间独立创造文明的惊人智慧,降至公元前1000年以后,周王朝以礼乐治世,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创造了异彩纷呈的理论主张和精神文化。秦汉统一中国,开创了只有比它略晚出现的罗马帝国才能相比拟的大国气象。在公元后的头一个千年,中国人把中原文化与南北少数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相融合,经过隋唐的统一,在西方世界尚动乱不已的时候,创造了“贞观之治”和盛唐气象。也就是说,在公元前后的两个千年间,古老的中国在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上都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为全人类的上古文明和中古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

收稿日期:2001-09-25

作者简介:李铁映(1936-),湖南长沙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中国在公元 1000 年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民族根源。

值此千年交替之际,登高望远,考察和反思过去 1000 年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命运遭际和文明收获,深化和重释“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历史意识,从中可以探寻重振大国雄风的精神动力和历史经验。

一、纷哉万象的千年历程

公元 1000 年,西方世界有不少区域尚未脱离分裂战乱的状态,欧洲各地陷入“千禧恐惧”,连一些帝国公牍也用“兹以世界末日行将来临”一类语调开头。意大利的威尼斯城举行与亚德里亚海的结婚仪式,把精制的戒指投入海中,自称是海洋后裔。而在东方文明古国,这一年是中国北宋真宗咸平三年,时值北宋开国不久,正呈现着一派文明昌盛的景象。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在这个时期发行了,其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到 11 世纪后期,华北已经拥有炼铁工业,每年生产约 125000 吨,主要供应军队和政府使用。这个生产数字,比 17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要多得多。因此,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这样写到:“近代以前时期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由此可知,这一千年编年史的帷幕,是在东西方民族生存方式具有强烈反差的状态下揭开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中华文明经历了比以往的几个千年都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转折,云谲波诡,纷哉万象。但是它往往绝处逢生,成为一艘不沉的东方之舟。这是我们民族生命史上的旷世奇迹。

两宋 300 年面临着改革发展以及如何处理与辽、金、西夏诸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这样两大课题。于是有了范仲淹和王安石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政”。在相对武弱文昌的现实格局中,国势虽蹙,经济犹能发展,文化上更具时代特色。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中原名都的繁华与昌盛。包拯与岳飞,成为家喻户晓的铁面无私的清官和精忠报国的英雄典型,对中国人的气质品格起到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建设作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标志,早在《易经》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在这千年间,辽、金、西夏、元、清诸朝,均为少数民族统治者当政,而元、清两代又曾入主中原,但他们无不根植于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土壤,使华夏文化在融合多民族文化中变得丰富多彩、枝繁叶茂。13 世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蒙古诸部崛起于北方,其后破金灭宋,结束了中国长达几百年的南北对峙局面。世居金朝中都、博览中华群书的耶律楚材,在行军施政中受到重用,推进了南北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从成吉思汗开始的三度西征,到马可·波罗的万里东来,东西方文明的剧烈撞击反而促进了彼此间的热切交往。明代建国之初,以强权统治为基础,依然保持着领先于世界的优势。就当时衡量综合国力水平的人口而言,中国已有一亿多人,而欧洲仅五千多万。15 世纪前半叶,中国仍出现了当时堪称“世界之最”的全书逾两万卷的《永乐大典》;并出现了云南回族出身的郑和率领大型船队七下西洋,交通亚非 30 余国的旷世盛举。戚继光大败倭寇的战将雄风,尤其是郑成功率师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壮举,均给这段历史添光增色。当然,殖民者东来也传递了一个令有识之士不无担忧的信息:对比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体制更新和科技发展,这个文明古国在专制主义的政治积弊和保守主义倾向的文化暮气的拖累下,逐渐放弃

了向海外拓展的历史良机,转而闭关自守,竞争意识与探险精神阻塞不畅。从此,以往一直领先于世界的优势开始丧失,令人产生一种暮色苍茫的悲凉。

中华民族以其强大的凝聚力维护着祖国的统一。在这 1000 年中,尽管也曾出现过分裂的局面,但是,始终把维护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视为国家尊严的一个基本标志。因此,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在“统一”二字中获得了崇高而实在的证明。我们不时也听到某些人对“大一统”传统观念说三道四,那么试问:没有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怎么谈得上给经济的充分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又怎么谈得上给人民的安居乐业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就全球范围而言,那些整天在民族仇恨和权力争夺中讨生活的人群,由于缺乏一种长时期在多民族和睦相处状态下的生活经历,自然也很难体会到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为生命线的强烈意识。17 世纪,满族势力入关主政,在血与火的搏斗中,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稳定西北,完成了中华民族统一的版图。其间虽然有多民族间的猜忌和笼络,甚至出现“文字狱”暴政,但是所谓“康乾盛世”,在本质上还是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集大成气象。出现过《古今图书集成》,出现过《四库全书》,出现过《红楼梦》,这都属于中华文化之“最”的行列。当然,从整个王朝文化发展历程来看,称当时集大成有余而创新机制不足,确也是一种事实。历史进入 19 世纪,曾是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却被英国殖民者用来制造炮舰,输出鸦片和战争,王朝国门被炮舰政策轰毁,古老帝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在 100 多年间,割地赔款,统一的版图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

中国人民不甘心俯首称臣,不甘心永远沉沦。面对着乘硝烟而降的西方强势文化,在经历了一连串丧权辱国的惨重教训之后,中华文明愈来愈深刻地走上自我更新的历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华文明在实业、政体和文化自身的日益深刻的层面上,汲取近代世界科学和民主的成果,推进自身由封建、半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这种现代转型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19 世纪末的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人,请自嗣同始。”在探求强国之路的艰难历程中,20 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世纪伟人。早在 1894 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振兴中华”这一响亮的口号,体现了无数爱国者的共同心声,树立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雄伟目标,成为 20 世纪最振奋人心的时代主题。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为“振兴中华”这一口号赋予了新的内容,把“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变为现实。毛泽东同志以前所未有的气魄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确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全新的阶段。革命领袖的学说与实践,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拓展了全新的境界。他们以旷世智慧和过人胆略,领导中国人民化艰难困苦为壮丽辉煌,使中华民族在迎接新千年之际,保持着东方巨龙腾飞的强劲势头。诚如江泽民同志在《2000 年贺词》中所说:“中华民族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经过伟大的革命,终于在本世纪中叶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从此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现在,中国人民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正在向现代化的彼岸阔步前进。”

这千年中国,有一个文明昌盛的开端,又有一个气壮山河的收束。其间如长江大河,在蜿蜒曲折中考验生命,在惊涛骇浪中显示雄力,在九派汇流中趋于壮阔,在凯歌高奏中走向辉煌。

二、震撼世界的三大发明

20世纪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这样描述最近1000年初始阶段的宋代文化:“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其中有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三项发明广泛运用于宋代。这三项发明连同汉代发明的造纸术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序论中说:“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美洲,因而使全世界、而不再是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种以及其他发明,中国人都居重要的地位。”四大发明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精神世界的视野,以此为出发点,人类逐渐走出各自的区域,开始认识到全世界之所以谓“全”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人类世界整体观念的革命提供了潜在的动力。

古代中国的发明往往取之迹,行之远,从日常生活中体验着天地法则,渐渐地给整个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深远的推动力。众所周知,火药的主要成份是硝石、硫磺和木炭,西汉以来的炼丹士在用这三种原料炼丹时,有时由于操作不慎而引发起火爆炸的现象。于是,人们注意到这种配方的独特效果。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所作《丹经》一书,就保留了火药配制的方剂。唐末,已经用它作“飞火”向敌人射击。北宋初年,冯继升开始用火药制成“火箭”,把火药用到军事方面。北宋首都开封设立的兵工场里,有专门制造火药的作坊。宋仁宗时,曾公亮、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武经总要》一书中,有三种制造火药的配方,还记载了十几种火药武器名称。经过改造,到南宋时又发明了爆炸性的“铁火炮”和“震天雷”。以后又发明了叫做“突火枪”的管型武器,就有点像近代的枪了。12世纪,火药和火炮的制造方法经过中亚而传至欧洲。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1875年版的自注中说:“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他在《反杜林论》中也说:“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以前一直攻不破的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经典作家的论述充分说明,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不仅在生产方面、军事方面起到推进作用,而且震撼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它不仅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契机和客观条件,更是为精神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换一句话说,欧洲从封

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划时代的变革，是和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以四大发明为标志，在15世纪之前，中国科学对欧洲的贡献，远远大于西方科学对中国的影响。据1975年出版的《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5世纪以前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有300多项，中国有175项，占总数的57%以上。据专家统计，欧洲从中国吸取的重大发明和创造就多达20多项。这种东学西渐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他们所提出的重要理论主张，多以中国为榜样，或者说，吸收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的精神特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看，中国传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们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传统的科学逐渐和欧洲近代科学融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它们的来源，尤其对欧洲中心论者来说，他们以为中国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不如欧洲的国家。虽然它有着古老的文明，但这种文明早就衰落了，近代中国的先进东西几乎都是从欧洲引进的。稍有历史知识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种无视历史事实的偏见。现代西方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客观地指出：“倘若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优越贡献，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过程，将不可能实现。试问若无火药、纸、印刷术和罗盘针，我们将无法想象，如何能消灭欧洲的封建主义而产生资本主义。”

人类的文化成果需要横向的交流和纵向的传承，而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为这种交流和传承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从而使人类文化成果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维度上得以保存和增值。中原与西域相交通的陆地丝绸之路，由于辽、西夏和金等王国长时间与宋处于交战状态，第二个千年伊始就开始受到阻隔，因而借助于指南针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相交往的重要方式。我国的海外交通，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以后历朝均有发展。宋代在广州及福建的泉州并设市舶司，而南宋的市舶收入几乎占了国库收入的一半。海外交通这样发达，与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的发明当然有着直接的关系。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当时已经有人造磁石的“指南鱼”和“指南针”，《梦溪笔谈》和《梦粱录》都明确记载，北宋末叶，我国航海船只已经使用罗盘针。一方面，说明这一仪器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海上交通，另一方面，由于海运的发展，又推进了我国的造船技术。宋元时代的造船技术在当时世界是首屈一指的，仅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官方造船就多达2916艘。近年在泉州出土的南宋海船，长24.2米，宽9.15米，排水量370吨。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世界多国海船在刺桐城（今泉州）打造。海船连同商品运来的是友谊和文化，中国输出丝绸、瓷器、茶叶，进口珠宝、香料。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交通亚非30余国，许多国家派遣使者来建立邦交和进行贸易。郑和的同行者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等，记载了所至各国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民的世界知识。万历、天启年间，徐光启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成为当时理解西洋并掌握西洋文化的第一人。指南针所带来的航海发达，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印刷术把人类智力创造加以物化，对于知识的创新、整理、积累和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在实质意义上提高了人类的文明水平。雕版印刷术出现于唐代。今天尚能看到的唐人刊刻的金刚经画像，就是唐代咸通九年（868）印制而成的，说明当时雕版技术已被

广泛应用,而且达到很高水平。北宋初年,雕版印刷日益兴盛,仅 1005 年国子监书版就多达十万余片,经史皆具。至今保存下来的北宋早期刻本,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中成为镇馆之宝。但是,这种刻版,每一页都单刻木版,每一本书都要单独雕刻,既费时,成本又高。随着文化普及的需要,书籍的流通越发频繁多样。传统的雕版印刷业显然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宋仁宗庆历年(1041—1048),毕昇发明了更为便利的活字印刷术。据《梦溪笔谈》记载,其方法是:“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神速”提高了工作效率,“简易”降低了成本。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给文化传播带来极大方便,使书籍文化走向民众、走向市场成为可能,因此它的更深远的意义,是创造了文化的新类型,并将传统文化推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课题研究,通过大量的首次发布的珍贵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展现了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和敦煌回鹘文木活字实物。这些实物无可争辩地告诉世人:活字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这项成果问世之后很快就传到日本、朝鲜,并经由西夏、波斯传到埃及和欧洲,14 世纪末,欧洲出现了木板雕印的纸牌、圣像、经典和拉丁文课本,德国古腾堡在公元 1456 年率先在欧洲用活字印刷“圣经”。小小的泥、木、锡制活字,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车轮。这是中国人民为世界文明创立的又一不朽功绩。

三大发明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犹如杠杆的功效,轻轻一撬,竟然使得人类文明一跃而跨越到新的世纪舞台。诚如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说:“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三、原创包容的文化品格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汉唐盛世的文学艺术、宋元以后的程朱理学乃至当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一不是中华民族适应时代要求,对于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中华文明的原创性与其强大的包容性紧密相联,在原创中包容,在包容中创新。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也是中华民族千古一贯的文化哲学。

宋代以后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盛行一时的理学。当时的理学有所谓“濂、洛、关、闽”之分。“濂”是指原居道州营道濂溪的周敦颐。“洛”是指洛阳的程颢、程颐兄弟。“关”是指陕西的张载。“闽”是指讲学于福建的朱熹。此外,还有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别开生面;陈亮的“永康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讲求实际。这些学说,其着眼点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是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一点上,大体还是相通的。对此,我们可以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它的弊端,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即宋明理学并非完全恪守孔孟之道,而是吸收融合了佛教、道教中的一些观点而加以融会贯通。这一学说从创立伊始,

就表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特点。此外,宋明理学讲究学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究文以载道,积极入世,也并非一无是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中的这句名言就鲜明地表现了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迥然有别的特点,注重人的精神修养和历史责任感。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特别是地处儒家文化圈的东亚诸国,至今还可以看到经过理学家改造后的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这种文化思想在与其他文化派别接触中,往往表现出一种雍容尔雅、博大兼容的君子风度。元明以后,各种思想学说,各种宗教教义,纷至沓来。道教之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都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过影响。尽管如此,正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还没有一种学说完全取代以儒家思想为正宗的传统文化。这说明,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说,如果是处在一种共处而互借的地位,彼此之间可能会有冲突,甚至对抗,但是在碰撞中,往往又会激发新的思想,进而取长补短,达到彼此间新的融合,新的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这种能兼始博、有容乃大的品格,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对于提高人类生存竞争和知识创新的境界,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私学、汉代的太学、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宋代以后的书院等,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教育思想,历来强调道德修养与知识传授的统一,历来追求经世致用与天人合一并重的原则,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民族心理与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应该充分认识到,一个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这千年的文化创造,绝不是仅限几位、几十位思想家沉思冥想的结果,而更多的是广大知识者、劳动者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用智慧和汗水培育出来的。这一千年,上承数千年的文明积累,不断地汲取民间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外来的学理工艺,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与中国的西文名字 *china* 相关联的瓷器,精美绝伦,举世赞叹。宋代有官窑、汝窑、定窑、钧窑、哥窑五大瓷窑。相传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派员在江西新平监烧瓷器贡品,连地名也因此改称景德镇。元代在此设立“湖田瓷局”,其后又赢得了“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的美誉。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瓷、五彩瓷,雍正、乾隆年间的粉彩瓷、珐琅彩瓷,精美程度又超过明代。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说明我们的工艺技术在这千年中确已达到很高的境界。

通观千年文化的演变,汪洋博赡,气象万千,倘若择其要者,除上述内容外,不妨再提炼出四个系列,即典籍文化、医药文化、建筑文化和文学艺术。管窥蠡测,摄取神韵,可以透视中华文明千年演变之一斑。

由于知识的积累和印刷术的发达,在这一千年文明进程中,典籍文化获得最充分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宋元以后对中国典籍的集大成式的整理。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有三个重要的时期值得铭记:第一是汉代对于先秦典籍的汇总,第二是宋代对于汉唐典籍的整理,第三是清代对于整个古代文化的全面清理。今天能够看到唐及唐前的典籍,汉人之外,最主要的功臣是宋人。他们编了许多文学总集、史部汇编及大型工具书,至今仍然是学人案头或公共图书馆必备的典藏,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册府元龟》、《乐府诗集》、《资治通鉴》、《建炎以来

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都出自宋人之手,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量刻印前代史书、文集及众多先秦两汉诸子著作。宋代对于古籍刊刻和研究,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清代近 300 年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更是远迈古人。他们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及《皇清经解续编》等都是影响深远的著作。此外,清人对于经学、史学、音韵学、金石学、舆地学、天文历算学、目录校勘学等也作了总结性的研究,其成就可以说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作为知识载体的文献典籍在传播文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大。推终原始,汉代、宋代、清代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无疑是文化传播的功臣。历史上文化传播的三个重要时期,有两个出在这一千年中。为此,我们应当时时怀着感激的心情重温这段历史。

中国医药文化自成体系,它把人体看作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又把人体自身看作有机整体,诊疾求本,辨证施治,造福于人类,举世为之赞叹。医学书籍之有刻本始于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年),官方校定医书,摹印颁行。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收集到历代医书 96 部,其中宋代人著述就多达 30 部,其数量居历代医书之冠。应当特别提出的是针灸学的发展。我国针灸学有着悠久的历史,针灸学著作和针灸图在宋代以前早已出现,但是没有人体标本。到天圣五年,就在官方校订医书的同时,太医王惟一用铜铸人体模型,上钻各种穴位,并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这部《图经》曾摹刻于石,由宋仁宗题写碑额。其印本更是广为流传,不仅大大便利了针灸的实际操作,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宝库。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开掘地基时发现了碑刻的残石,足以证明历史的记载信而有征。金元时代有所谓四大家名医之说(刘完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至明代,以李时珍《本草纲目》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医药学,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传统中医药学外,地处青藏高原的藏医学从 15 世纪开始,以《四部医典》为依据,形成南北两大学派,也以其独特的理论和疗效别树一帜,世所瞩目。

中国的建筑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深邃的宗教理念和精美的工艺技巧。它以丰富多彩的空间造型,给世人留下无限的美感。现存古建筑物,多为这一千年所建,譬如宋代修建的开封铁塔和太原晋祠圣母殿,辽代修建的蓟县独乐寺、应县木塔等都是杰出典范。卢沟桥始建于金代,同一时期出现的云南景洪县傣族飞龙白塔堪称精品。元代的居庸关也异常精美。今存明清建筑,更是佳构如云。明代重新修复的长城为地球上最大型的建筑物,明清两代递修的北京紫禁城,也是世界各国帝王宫殿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清初重建的拉萨布达拉宫,雄伟豪华,宫殿与山丘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堪称艺术杰作。此外如明十三陵,清东陵、西陵,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北海白塔和静心斋,以及天坛祈年殿,还有民国年间建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在规模、结构上都有巧夺天工之胜。即使是民居建筑如北京的王府花园和久负盛名的四合院、山西平遥的深宅大院、江南的贵族园林以及云南丽江的古城街道等等,也无不透露着悠久而又丰富的文化底蕴。北宋初年喻皓的《木经》及其后李诫的《营造法式》,清朝初年李渔的《闲情偶记·居室部》以及雍正年间的《工程做法则例》,直至 20 世纪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都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建筑艺术的理论、技术和历史。这千年的建筑艺术以其独特的结构体系和高超的造型装饰,成为中国历史不曾消逝的载体和中国人民聪明才智的象征,是矗立在东方大地上的令人叹为奇

观的丰碑。

四、精神享受的四大名牌

文学艺术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文化。一个民族是否有美化的心灵,雅化的素质,净化的聪明和刚强的意志,不妨看一看它的文学艺术。千年中国的文学艺术虽然也出现过泥古守旧、萎靡不振的现象,但其中的优秀之作对于鼓舞中国人的意志,陶冶中国人的情趣,提高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丰富中国人的心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形式千姿百态,名篇杰作脍炙人口,长期浸润着人们的智慧和人格。经过漫长的历史考验,文人画、书法、古典诗词和京剧,成为最富特征和魅力的中国艺术样式,成为中国人精神享受的四大名牌。

宋以后的文学艺术史中,不乏被誉为诗书画“三绝”的奇才。北宋的苏轼、文同;元代的赵孟頫、倪瓒、王冕;明代“吴门四家”中的文征明、唐寅以及徐渭;清初四画僧中的八大山人和石涛,其后“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近人则有吴昌硕。他们工诗、善书、能画,成为众所倾慕的文化素质雅博高明的象征。书法是汉字的舞蹈,也是一种抽象的艺术,令高雅的中国人在诗化的线条中陶醉。继唐代欧、颜、柳的端庄严整之后,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以意运笔,韵味超逸。元代赵孟頫端丽妩媚,圆熟沉著。直至今人毛泽东体,俊爽豪迈,荡漾着一股磅礴千古、笔削山岳的气势。清人梁巘《评书帖》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王澍《论书剩语》说:“唐以前书,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可见这千年的书法艺术出手不俗,别出心裁而造诣深厚。

千年画史中,自然也不应排除宋徽宗赵佶那种工细华贵的花鸟、人物画,不应排除宫廷画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及历朝的工笔人物、花鸟、山水画。自然更不应忘记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壁画,如新疆高昌回鹘王国宫廷寺院的壁画;不应忘记流布于民间的木刻年画,如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朱仙镇的年画。但最能显示出中国土人才气的,却是从宋代就形成的传统的文人写意画,它的诗化特征与西方文艺复兴后绘画的写实化特点,形成了东西方各具千秋的两大潮流。自从北宋的全才型文豪苏轼推崇王维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后,文人画风追求诗趣和意境逐渐成为习尚。元代钱选、赵孟頫接上文人画的血脉,而被画史称为“元四大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进一步强化了笔情墨韵。直到明代“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又拓展文人画技法,灵动中融入精细;徐渭满纸淋漓的花果写意画也影响深远。董其昌的“南北宗”画论,又为文人画推波助澜。清初的“遗民画家”以八大山人朱耷的大写意最为有名,石涛的山水兰竹也别有一股奇气。其后“扬州八怪”借梅竹禽鸟抒写胸间愤懑。清末海上画家任伯年、吴昌硕或师法造化,或以金石书法入画,都开辟了文人画的新境界。直至近代的齐白石、徐悲鸿,或才气清逸,花鸟虫鱼饶有神韵;或吸取西洋技法,奔马人物咸具工力。这些画家作了 1000 年的画,同时也是借画面结构和线条写了 1000 年的书法,做了 1000 年的诗,从而使中国文化洋溢着诗的神韵和画的色彩。

汉族文人古典文学发展到中唐时代,开始由过去一统天下的局面,演变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现实。所谓三分天下,首先是由于韩柳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古典散文创

作的繁荣；其次，起源于民间的小词也逐渐登上文坛，引起文人重视，并尝试拟作，没有几十年时间，就波浪推涌，汇为奔流的江河。唐诗过后，虽然宋诗颇盛，向来有唐宋并称的美誉，但作为时代性标志的文体，无疑已是宋词的天下。词原本是配乐的诗歌，唐代称之为曲子词。翻开《全唐诗》，发现许多诗也是可以入乐的。为了演唱的需要，在原有的四言、五言，甚至七言诗的基础上，加进一些衬字，使其变得长短不一，便于演唱。词又称长短句，在五代时出现的《花间集》和敦煌石的《云谣集》中已经定型。至李后主出，把词从花间酒席引上抒发作者真情实感的创作道路。宋词发展的主流是倾向于婉约，柳永、周邦彦、李清照、姜夔，是其中翘楚。当然，宋代也有人在词作中输入豪放气质，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都是如此。可惜他们所开创的词风在北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南宋以后，当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半壁江山沦为异族统治之际，以岳飞、陆游、辛弃疾、张元幹、张孝祥、刘克庄、刘辰翁、刘过、陈亮等为杰出代表，以收复中原相号召，唱出时代的强音，一扫柔靡轻丽之风，将宋词创作推向高峰。辛弃疾之后，虽然作家辈出，名作也不少，在艺术上也有发展，但是从俊爽豪放上说，没有人能超越北宋苏轼和南宋辛弃疾所创立的两座高峰。而后，词作为时代标志性文体就让位于元曲了。

元曲实际包含两种文体，一种是散曲，一种是杂剧。这两种文体均起源于南宋及金代，是一种综合了前代多种文学艺术形式而成的新型文体。尤其是元杂剧，代表了元代文学的高峰。据《录鬼簿》等文献考证，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多达 100 余人，作品 500 余部，现在还保留 160 多部。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杰出作家，以及《西厢记》、《窦娥冤》、《梧桐雨》、《汉宫秋》和《赵氏孤儿》等著名作品。与杂剧相互辉映的南戏，则出现了《琵琶记》。进一步衍化为明清两代的传奇，则以汤显祖“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以及清康熙朝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最为著名。清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广泛吸取各种戏曲的精华，适应北京的语言风俗，逐渐发展成影响全国的大剧种——京剧。到 20 世纪前中期，京剧舞台上出现了以梅兰芳等“四大名旦”为代表的诸多流派的杰出表演艺术家，饮誉海内外。由于他们的贡献，中国传统的表演艺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成为国宝级的艺术品种。

中国小说也许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文学形式，战国时代发其端，汉魏六朝分门立派，形成志怪、志人、杂史诸门类，到唐朝就出现名叫“传奇”的小说精品。但是这一千年与前一千年的小说，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异。宋元小说接受了佛教俗讲的影响，由说话人在勾栏瓦舍表演，因而走向市场，并吸收了民间智慧，这就为这种文体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和文化的源泉。宋元以后虽然还出现过属于志怪、传奇类型的《聊斋志异》这样的短篇杰作，但是源于民间说话，其后又有文人不同形式参与的章回体长篇和话本体短篇，已经逐渐成为最有成就的文学门类，明清时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六大古典小说名著，成为古代叙事文学的里程碑。晚清小说出现变异，讽刺或谴责之风极盛。“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现代白话小说脱颖而出，以鲁迅为先驱，出现了茅盾、老舍、巴金、李劫人、沈从文、丁玲、赵树理等文学巨匠。20 世纪中后期，又出现了《红旗谱》、《青春之歌》等文学名著。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拥有众多的读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千年间有《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三大史诗崛起于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被惊叹为人类史诗发展史上的奇观。

这一千年文学艺术的发展表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拥有最丰富文学艺术资源和最精深文化传统的民族之一,它的精神文化创造能力也是第一流的。

五、千年文明的四大特点

回首中华文明的千年演进,给人以丰富的启示。这里既有光彩夺目的辉煌,也有惊心动魄的危难。辉煌与危难交替并存,使千年“中华文明经验”蕴涵着世界上最深刻的“文化哲学”。一个曾经为人类提供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并且继续创造着典籍文化、医药文化、建筑文化和文学艺术“四大奇观”的古老民族,相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变革,17世纪以后日益显得滞后、滑坡、衰落,甚至陷入深重的危机。如此世事沧桑的巨大反差,难道真的如孟夫子所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难道真的有什么“宿命”吗?我们被历史规定着,我们又在能动地创造着历史。任何漠视和割断历史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孟夫子说过:“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千年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发掘和批判性的反省,用来作为创造新历史的理智支持和精神动力。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自审意识”,其中充溢着一种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顽强精神。

自己是自己命运的决定者和把握者,失去自信则只能受命运的拨弄。中华文明一千年的发展变化,其中所蕴涵着的最深刻的哲学意义,上文已经有所论述。这里还想就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四个明显特点,并由此而产生的三重疑惑作进一步的阐述,并尝试着就新世纪所面临的新课题略抒己见。

第一,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民族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在东方文明起源之初,就包容黄河、长江、漠北、岭南的多元区域文明,并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向中原内向汇聚以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双向认同趋势。隋唐五代以后,辽、金崛起于北方,元、清统一中国。尽管是少数民族占据最高统治地位,但是他们依然继承、发展并推进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前进,从而避免了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过的文明传承中的断裂悲剧。辽代疆域极盛时期,实行北南两面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元代开国统治集团采纳耶律楚材的主张,“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忽必烈的周围形成儒士幕僚集团,甚至他本人也被尊为“儒教大宗师”。清代虽然也是少数民族统治,而在“收拾世道人心”方面,也采取了一种崇儒重道的积极政策。纵观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每当改朝换代、民族冲突转剧之际,中华文明总是适时地起到了民族精神粘合剂的作用,互借所长,融合再生,使整个民族文化在痛苦中重获新的希望,走向新的辉煌。

第二,中华文明表现出强大的兼容性。对待不同文化的智慧,乃至纷繁复杂的宗教派别,中华文明总是以其中和的气质和集美的胸襟,兼收并蓄,容纳百川。从公元1世纪到10世纪,中华文明充分吸收了以印度西域佛教为主要成份的外来文化,同时又改造了外来文化。这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传统文化更健康地向前发展。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的精神信仰有很大的区别。没有文化上的兼容哲学,势必国无宁日。凭据着中华文明的中和精神和兼容哲学,各种文明模式和宗教流派往往能够在长期的共存和冲突中,逐渐发现和汲取对方的长处,寻找和重释相互可以沟通的精神脉络,在某种特殊的文化张

力和渗透中探寻共同发展的可能。魏晋玄学实现了儒道合流，唐代三教并重，为大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作为中国文化重要派别的儒、佛、道三教在宋代走向融合。这个时期，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出入于释、老，反求诸六经”，从各种思想中吸取养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金、元时代与儒者关系极深的道教全真派，创教之初就“欲援儒、释为辅”，丘处机拜会成吉思汗时，建议向儒者垂询治国之道，“以敬天爱民为本”。并不是说他们创造的教派和学理有何等高明之处，而是说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存在着化解冲突、走向共存的因素。尤其在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日益成为困扰当代世界的焦点问题的时候，这种兼容精神必将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精神财富而被发扬光大。

第三，中华文明的原创品格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向外拓展和形式转移的强大功能上，从而为自己拓宽了可供利用的智慧资源。以文学发展为例，一种文体发展到极致而转向僵化、衰落的时候，往往有一批敏锐的、有才华的文人把目光转向民间，从尚未定型的文体中汲取养分，开创新的天地。正如鲁迅所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作为时代性文体的宋词，最初在隋朝不过是把西域胡人的俗乐转化为燕乐，盛唐初期渐渐流传于教坊，无名氏依曲填词，中晚唐诗人参与其事，最终大盛于两宋。元代戏曲源于“近代教坊院本”。所谓“院本”，就是流行于伶人聚居的行院中的戏曲底本，可见也是民间艺术形式刺激了文人创作“新声”的灵感。成为明清时代标志性文体的小说，在晚唐五代接受了佛教俗讲的影响，在宋元时期流行于民间，最后由文人加工定型，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四大奇书”。这一系列重大的由俗入雅、以雅化俗的文体转移和创新现象，说明中华文明最具有创造性的部分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向不同的文化层面开放。这一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向外国文化开放，从而推动自身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先后辉映。

第四，中华文明讲究事物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注意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外部关系，在文明创造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老子强调事物法则的相互联系，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医学讲究把人体作为有机整体，人体又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已如前述。从这一千年初，宋朝太医局翰林医官铸造第一具针灸铜人，到这一千年后期，清朝宫廷太医使用《明堂经络图》，都是把人体内外各组织器官看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由一症状而作全息透视，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局部刺激而调动全身的内在潜能。中国绘画不拘泥于定点透视，而讲究流动视点的统合观察，山水云林，远近浓淡，都是用心和自然直接对话，从中体悟诗趣画境。园林艺术讲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讲究曲折错落的布局，达到曲径通幽的诗趣；又巧妙运用“借景”，把远近山峦塔影、河湖树木借来与园内之景相映成趣。中华文明精华中这种对人、对艺术、对天地万象的协调性和整体性的理解，与现代环境保护意识有相通之处，而且还具有一种潜在的诗意。

六、知耻而勇的忧患意识

洞察世界大势的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革除积弊，充分调动和开发内在潜力的精神酵

素。久历辉煌的中华文明，本应在世界潮流中发挥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但在这一千年的后半期的二三百年间，却江河日下，危机重重，终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历史留给中华文明血泪淋漓的沉重教训，在纵观历史的时候，既要增强我们发愤图强的信心，更要加深我们发愤图强的忧患意识。知耻而勇，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坚韧程度的考验。

历史沧桑巨变的分水岭就在 15 世纪。15 世纪以后的中国，特别是明代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五个皇帝主政的 16 世纪，是中国国力下滑，逐渐与世界拉开距离的关键的 100 年，在这 100 年间，尽管统治阶层的有识之士也感受到了社会危机和巨大压力，也试图通过各种改革的措施对此作出反应，但是，封建制度中最具权威的皇权中心阶层过着醉生梦死、荒淫无度的生活，兼并土地，耗尽财力，加之宦官专权、藩王叛乱、官僚党争，把整个政治运作机制推进了腐败与内耗的怪圈，从而破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清代乾隆后期，盲目的自大和制度的僵化，致使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有一位打着为乾隆祝寿旗号来华窥探虚实的英国使官说：“支那朝廷于新学之发明毫不关心”，“不复以科学为人生所急”。而这个时候的西方，正是培根、笛卡尔的科学思想和实验方法生根开花，以牛顿的万有引力为代表的科学理论蓬勃发展，系统生物学、电学、化学取得重大成就，启蒙运动又逐渐树立起理性、法制和知识权威的世纪。

西方社会在技术起步上原本落后于中国两千年，这个时期首先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改进和运用入手，在不到二三百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首先，尼德兰、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宣告西方资产阶级的崛起以及资本主义的扩展。从此，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西方社会一日千里地赶上和超过了在缓慢中爬行的中国封建社会。其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环游全球的壮举，引起了商业上的革命，扩大了世界市场，迅速把南北美洲、非洲、印度纳入其殖民地方式的商业市场系统。冒险开拓市场，市场带动工业，工业刺激科技，一盘棋就这样走活了。同时，德国进行了宗教改革。特别是英国，从圈地运动开始，棉纺、制造、交通运输业取得重大发展，并且迅速向海外扩张，以赤裸裸的暴力手段进行征服和掠夺，用火与血写下罪恶累累的殖民史。商人在政府的支持下，组织贸易公司，专营海外某些地区的商业，进行大规模的远程贸易扩张活动。下列具体数字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1579 年伊士特兰公司成立，经营地中海东岸的贸易。1588 年几内亚公司成立，专门由非洲输出黄金和向美洲贩运黑奴。同年，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891 年冲破葡萄牙的海上封锁，进入印度洋。1600 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专门负责从好望角到东方一些国家的贸易，从此不遗余力地打通与中国通商的道路，1622 年英国伙同荷兰进攻澳门未果，抢劫了中国两艘装满货物的船只。1637 年英国人威尔代率领的舰队，闯进珠江口，炮轰了虎门炮台。他们在海盗式的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英国从 18 世纪 50 年代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不到百年的时间，由于工业化和军事扩张的结果，其生产力得到 300 至 400 倍的提高，成为当时第一工业王国。随后，欧美其他各国紧随其后，实现工业化革命，使得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工业总量中所占比重迅速攀升。据《大国的兴衰》统计，1750 年，中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的比重仍然保持在 32.8% 的水平上，而整个欧洲不过占 23.2%。但是，只过了 150 年，1900 年，中国仅占世界工业总量的 6.2%，而欧洲一跃占据 62%。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殖民者在国内与国际采用双重价值标准，是其惯技。当全球竞争盛行弱肉强食的原

则时，残暴一再强奸公理，不思振作的弱国非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不可。东西方列强乘中国国力下滑之机，开始了野蛮的侵略行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俄国、德国、日本等先后插手了瓜分中国的阴谋。1514年（正德九年），葡萄牙人首先到广东，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窃据澳门。1575年（万历三年），西班牙人到达福建。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的军舰首次闯进中国领海。1624年（天启四年），荷兰人侵占台湾，直至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被郑成功驱逐期间，在岛上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野蛮地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第三款规定，中国永远割让香港给英国。1856年（咸丰六年），英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炮轰广州。第二年英国和法国联合出兵，攻陷广州。1858年（咸丰八年）攻陷大沽，直逼天津城下。英、法、俄、美四国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攻陷北京，焚毁圆明园，强迫签订《北京条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租借给英国，期限99年。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英军入侵西藏，占领春丕、帕里等。英、法、荷兰等国家从东南沿海直扣中国大门，俄国则从陆路拆毁中国的篱墙。17世纪30年代以后，俄国的侵略矛头已经越过外兴安岭，直指中国的黑龙江流域。1850年（道光三十年）侵占了黑龙江口的庙街。1853年（咸丰三年），侵占中国的库页岛，并策划入侵黑龙江地区，以便“牢固地控制邻邦中国”。1856年（咸丰六年）后，沙皇俄国乘清政府内外交困，东北边境“各路无防”的时机，背弃《尼布楚条约》的规定，大举入侵黑龙江地区，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双管齐下。1858年（咸丰八年），迫使中国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改订条约》以及以后五个勘界条约，占领我15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

后起的殖民者也不以他们在本国独立、统一和维新中受到的欺侮、凌辱为鉴，略动恻隐之心，反而自己一经强大，就把欺侮、凌辱强加给其他弱国。他们的信条是落井投石，弱国的命运自然是雪上加霜了。自19世纪下半叶起，德国、美国、日本也相继加入到瓜分中国的行列。早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入侵中国台湾岛。后来日本又迫使清政府订立《北京专条》，清政府给银50万两，日军撤离台湾。1894年（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翌年，“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1914年（民国四年），日军借口对德宣战，侵占山东潍县车站，旋即占领济南，胶济全线遂为日军所占。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舰强占胶州湾。第二年，强迫“租借”胶州湾，把山东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效仿，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美国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六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承认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特权，同时要求在其他各国的租界和势力范围内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各国享有投资权利。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日益膨胀起来。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新老殖民者组成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年签订《辛丑条约》，在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诏令下，赔银四亿五千万两，超过清政府年度收入的5倍。若加上《马关条约》的二亿两，所负赔款之沉重，足以扼杀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机。

面对着日益沦落、饱经蹂躏的破碎山河，人们为之感慨，为之疑惑：

中国的科学技术传到欧洲，伴随而来的是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工业革命。而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一种文明，两种命运，这是什么原因？

同样是环游世界，哥伦布的成功，激发了欧洲人的拓展精神，决心通过海洋战略来改变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对比，其结果是获得丰厚的财富，并由此刺激而产生了追求更多利润的欲望。而郑和七下西洋虽然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却主要是为宫廷享乐生活增添新鲜刺激，缺乏用域外探险拉动国内生产需求的强大机制和精神动力，并没有形成更大范围的冲击波。这又是什么原因？

当欧洲相继完成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之际，昔日的赫赫天朝却逐渐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最终成为西方列强蚕食的对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反省自己比起怨天尤人，更能够体现一个民族自我拯救和振兴的历史理性。100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一直在理论与实践这两个层面上苦苦地思索着这些萦绕于怀的困惑，一直在努力寻求着重振中华雄风的出路。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挽救中国的实践活动相继失败，更促使人们睁开眼看世界，从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中，从中华文明的盛衰际遇中评估礼乐文化的优劣，反思家庭文化与探险精神的矛盾，探寻科技思想和义利观念的冲突，衡量创新意识与社会体制革新的关系，强化了国人的危机意识。林则徐、魏源等早期启蒙思想家重新审视了世界大潮的变化，发觉自己落后的危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用相当大的篇幅专门评述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就，逐渐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保证。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黄遵宪也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欧美诸国在近代以来所以能够飞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他说：“今欧美诸国，崇尚工艺，专门之学，布于寰宇。”“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业之用，富民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也。”这种观念，在儒家文化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啻是破天荒之论。科学技术的发明，绝非一个孤立的科技问题，而是与国家政治体制相配套，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国民科技意识相联系。中国封建道统文化崇义非利，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对于科技自觉的和体制性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排异功能。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很难设想由封建统治集团来建立相互激励和推进创新的科技体制。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有头脑、有良知的志士仁人痛定思痛，日益清醒地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中对于科学技术的歧视与偏见。科技救国，一时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切追求。

然而，当中华文明进入第二个千年的最后一个世纪时，异常严酷的现实告诉中国人民，国家的兴盛，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影响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战略地位，并成为一个国家强大和兴盛的主要推动力。但问题是，谁来操纵或破坏这个推动力，谁来促进或阻碍这个推动力，这才是事物的本质所在。正如战争年代，武器虽然是取胜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经济和科学技术虽然至关重要，但却是由人来掌握的。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确领导和有效机制，如果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渴望科技救国，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由此可知，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宣告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气壮山河的宣言在中国命运进程中具有何等伟大的

史诗般的份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史诗般震撼人心和成效卓著的艰苦奋斗,才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梦想变成现实。在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战略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昂首挺胸地站立起来,脚踏实地,向中华文明的伟大振兴迈开雄伟步伐。

七、再创辉煌的崭新世纪

人类进入新千年以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每一个有所作为的民族都试图从战略的眼光审视未来世界的走向,并对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行更高层次的思考。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它要求打破地区或国家的封闭与限制,在国际市场的范围内实行对资本、技术、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迅速流通和优化组合。它有可能使进入新千年的人类获得享有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的广泛机遇。同时,这种经济全球化趋势,仍是以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性、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性,以及发达国家操纵市场游戏规则的霸权姿态和利己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因此机遇与风险同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时时都感受到时间的压力,速度的压力,全球战略举措上的压力,并在多重压力中经受着民族生命力坚韧程度的考验。当前,某些崇尚霸权的国家用“民主”、“人权”一类词语包装它们的价值观,干涉别国内政,并通过卫星全球转播、互联网超国界联通以及电视电影节目大量倾销的方式,对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文明进行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脱色处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保护人类文化生态,维护多民族的文化景观,为这个世界多保留一份精彩,也就成为新千年人类发展的一项战略性目标。

中华民族对新千年充满乐观。这是深晓机遇与风险同在的负责任的乐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经济和科技诸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漫长的、需要长期发愤图强的过程。为此,我们在前人未曾做过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必须更加锐意进取,勇于探索,充分吸收全人类优秀的科技文化成果,弘扬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重振汉唐的开放精神,使之融入现代文明的长河中,继续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独具神韵的贡献。

从这一千年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西方向东方学习,并很快将这种学习成果转化成巨大的生产效益。譬如说我国的纺织工具手摇纺车,从发明到宋代时多锭纺车的使用,前后大约经过了 1300 年,此后到明代 600 多年,纺织工具似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欧洲 14 世纪才出现手摇纺车,比我国晚近 1600 年,但是到 16 世纪就出现了多锭纺车和自动纺车,这中间相距不过 200 多年,比我国缩短 1100 多年。又譬如我国从春秋末年即开始有了冶炼工业,而欧洲从 12 世纪才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炼丹术,中国先于欧洲 1700 多年,但 15、16 世纪,欧洲与中国在冶炼设备、冶炼工艺等方面基本达到同一水平。这中间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冶炼技术从发明到成熟用了 2100 年,而欧洲仅仅用了 400 多年。时间就是优势,科技创造财富。从 1780 年到 1870 年,最早发生技术革命的英国,纺织用棉量增加 200 倍,钢铁产量增加 350 倍,煤产量增加 42 倍。特别是这千年的后半叶,欧洲的科学技术呈加速发展趋势。电机和内燃机的广泛使

用,不仅使原有的重工业部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导致一系列新的重工业开始在世界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带动全部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这一事实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加速自己科技文明的发展,就必须借鉴全人类最优秀的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刺激创新,而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16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工业革命的完成,欧美诸国逐渐后来居上,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相比较而言,近代中国落伍了。

我们必须化忧患意识为全面振兴的精神原动力,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10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人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它有着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在保持自己强大的政治优势的同时,完全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汲取他人之长,创造我们自己的“中国奇迹”。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一千年,中国在最近20年中创造了以往所不能想象或不敢想象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精神财富,并且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地迈向小康社会。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保持在年均8%以上。到2000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9万多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折算,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居世界第7位。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743亿美元,在世界上的位次由1999年第9位上升到第8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今后10年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在7%以上。照此速度发展,那时我国生产总值将达到2万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其生产总值和外贸总额均占世界总量的5%以上。我们国家真正可以说已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富国”扎实地迈进了一大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新的一极而自立于世。这与100年前百孔千疮的旧中国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纵观千年,回顾百年,我们百感交集。建国50多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要发展壮大,归根结底,就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的同时,充分地汲取和转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从而创造出既无愧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光荣历史,又能推动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社会形态和物质精神成果。在跨进21世纪大门之际,我们冷静地反省自己走过的辉煌而又曲折的历程,深刻地总结这一千年中外文明兴衰交替的经验教训,最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已为历史证明、并将继续为历史证明的真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重塑辉煌的。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振兴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住的。

中华文明已经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走进新的千年,迎面而来的是复杂而又难得的历史机遇和严峻的挑战。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进入新世纪所面临的三大任务。宋人曾公亮诗云:“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驾驭全球波澜壮阔的风浪,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已经成为新千年的伟大目标。对此,我们胸罗风云,充满信心。

2001年6月18日

[责任编辑 蔡德贵 刘京希]